



生命细节里的故乡

——评《我热爱的人间》

数写作者,因为缺少个性化的当下打量和历史钩沉,因而,笔下的故乡形态趋于同质化,情感表达流于浅层的风物咏叹。要想让故乡成为一种独特的记忆符号,就需要诗人真正进入故乡的生活内核和历史经验,选择属于个体但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,所以,切入点的选择尤为重要。在对家乡的书写上,细小琐碎的事物比宏大的叙事重要,多维度观照比单一维度的抒情重要,打捞那种被隐蔽的不和谐比描述那些和谐重要。说到底,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和可以承载独特发现的生命细节,才有可能让诗歌饱满起来。在薄暮的诗歌里,我看到了沉淀成为他骨血的乡间风物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,不是模糊的印象,而是具体可感的铁器,是一枚被父亲订到墙上的钉子,是墙上烟熏火燎但依然让人敬畏的祖先,是一条只有诗人用文字记录的河流,是大地生出的谷物,是构成乡间风景的草木,是乡间的伦理和古朴的信仰……

薄暮说,每一棵树,都有自己的名字,这些我们熟知的或叫不上名字的树木,就像诗人的乡亲们,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泥土,把自己的痛苦和希望交给泥土。他们身上的伤疤也许会变成注视人

间的眼睛,然而,也只是沉默地注视着,他们最终将成为泥土的一部分。诗人发现了这一点,但他始终坚信,它们都不应该籍籍无声,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,都有被记录、被承认的权利和尊严。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。

那些乡间的人事,让诗人重新打量生命和时间,重新理解意义与价值,更重要的是,在回望故土与往事的时候,诗人更清晰地认识了此在的“我”——在线性的时间延伸中,在血缘不间断的轮回里,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,日子七短八长,人间依然宽广。但诗人并未因此而陷入虚无和绝望,因为在回望中,他分明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倔强与坚韧,明白了人间生生不息的理由。

可以说这样,在薄暮笔下,故乡的历史和当下相互抵消又相互呈现,相互凝视又相互印证,因而,那些诗作才会有人生经验与历史经验的高度契合,才会散发出只属于诗人独有的气息。诗人始终相信,即使人生有太多的不堪,那也只是整个生命版图上的一个斑点,它不是全部,更不是唯一。万物各有其时,世界自遵大道,生命的残缺或者遗憾原本就是生命过程的应有之义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《错位的复仇》



本书是刘勃“拆装《史记》”系列第一本。这是刘勃继“青春中国史”后又一力作,巧妙拆解《史记》的原有文本,通过考证、比勘、推理、猜想,将其拼装成另外一种故事结构,试图在宏大叙事和真实历史之间,寻找属于个体生命的鲜活故事。从战国时代开始,许多人把自己的复仇梦想寄托到伍子胥身上,“伍子胥”慢慢竟有了些复仇之神的意味。本书中,作者将伍子胥复仇的前因背景、过程布局、后果影响细细道来,既精准刻画出春秋末期的纷乱现实,也重塑了一个血肉丰满、充满错位的复仇故事。

作者刘勃,历史作家、编剧。

《平乐县志》



《平乐县志》是作家颜歌最新长篇小说,也是其“平乐镇系列”终曲。全书共14章,以平乐镇东街为故事发生地。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,串起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离合与小镇官场的世相起落。当这两条线交汇,丝丝缕缕剖开局中之局。整部小说像平乐镇的一份文学档案,全景式地记录下2010年左右平乐镇东街的全貌与人心浮动,折射出小镇的城市化、互联网经济发展等诸多时代变迁的印迹。

作者颜歌,小说家,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我们家》《五月女王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》等。

《多谢不阅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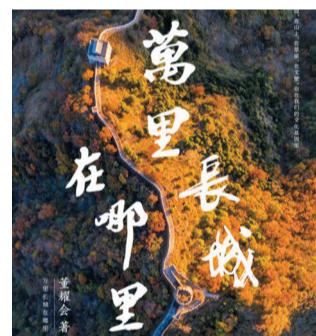
图书市场越发繁荣,装帧越发精致,书店越发引人驻足,作家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红遍全球,但真正的文学近乎绝迹。杜布拉夫卡假借一个被英美文学市场冷落的东欧人之口,一一吐槽当今文学世界的诸多乱象:隔三差五就会横空出世的文学新星;被反反复复“重新定义”的文学;各显神通的身份政治书写;本末倒置的版权运营模式……文学失去了它的准入机制与评判标准,任何明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宣传他们的新书,任何一种负面评价都能被狡黠的市场拿来营利,文学不再纯粹。

作者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,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,著有《渡过意识之流》《谎言文化》《无条件投降博物馆》《疼痛部》等作品。

不期而遇,我读到了薄暮的诗歌。从他的故乡开始,到他的“空谷”结束,我读到了一种从尘世启航最终又皈依尘世的灵魂摆渡,读到了一种深情而又多汁的尘世留恋与人世理解,读到了一种对合理的人间秩序与生命伦理的追寻与守护。

在薄暮笔下,故乡不是一种抽象概念,而是鲜活而又粗粝的人间烟火,是苦难与希望同在的田间劳作与形态各异的生命细节。它们是母亲生前养的鸡,是因为害怕被杀而不敢回家的老牛,是长满了狗尾巴草的田园,是祖父的《增广贤文》,是父亲坟前儿子不抽的烟和父亲不喝的酒……借助这些记忆和事物,诗人打开了时间的闸门,让昔日的生活现场有了当下的纹理和体温。

我们知道,故乡是所有写作者共同的灵感开始和不绝的创作源头,但大多



以磅礴气势彰显民族精神

——读董耀会新书《万里长城在哪里》

连成一体,加起来长度有5000多公里,自此,万里长城的威名便传颂至今。

其次,作者依照年代的顺序,对各朝代修建长城的历史,作了总体的概述。从时间上说,中国修建长城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,不同时期的长城分布区域不同,构筑方式也不尽相同。秦朝,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年代,也是长城建造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。在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之大成的基础上,无论是在筑城的型制,还是材料的使用、以及建筑风格的总体把握上,都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定式。而明朝,则是第二次集中修建长城的时期,也是筑城技艺鼎盛的时代。明代修筑的万里长城工程量最大,工程质量也最高。建造者精心筹划,一改过去低矮、实心的做法,创建了既可庇护军士免受风吹雨淋,又可贮藏军火器具的骑墙台,从而修成了城墙高峙、墩台林立、烽火台相望的坚固军事防线。而从建造朝代来说,除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秦汉、明之外,北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、五代、辽、宋、西夏等不同政权,均不同程度修筑过长城,或修建了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。在此如此漫长的时间段内,众多的朝代都在修建、建造长城,尽管建造形式不一、工艺各异、风格也纷繁多变,但总体上而言,还是达到了维护国家安宁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。

首先,作者从地理的维度,简要分析了修建长城的历史成因。可以说,长城的形成与华夏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。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,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。东边是海洋,西部是高原,西南有高原和山,在古代,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屏障。只有在北部,通过广阔的草原可以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产生联系。故而,时常有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一带袭扰。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,于是乎从西周开始,各诸侯国纷纷开始筑起高墙护起城郭。而到了秦朝,雄才大略的秦始皇,遂下令把各诸侯国修筑的高墙垛楼

辽阔的北方地带和中原腹地,土质疏松,气候湿润,非常适合农业生产,广大劳动人民在此安居乐业,创造出了不朽的华夏文明,也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长城精神。而这一切,无不吸引着长城外的游牧民族,中原的饮食、服饰、建筑,甚至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农业等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,更是让这些四处漂泊的外族仰慕不已。而长城在尽情发挥其军事功能的同时,亦像一条熠熠生辉的文明飘带,把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、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,以及众志成城、团结一心的长城精神,一并输送到长城外、古道边的很多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没有长城,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政治环境,人民也不可能宁静祥和地生活在这里,精深悠远的中华文明,更是很难做到从未中断延续至今。相反,这条闪光的飘带,还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和森林文明,沿着这条蜿蜒的“巨龙”,一直传送到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,融入到华夏文明的汨汨血脉里,共同滋养着一代代意气风发的中国人。

万里长城万里长,长城内外是家乡。而今,随着时代的变迁,长城的概念,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军事功能已日益退化,但它的文化价值越发凸显。在它身上所蕴含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,以及充溢出的磅礴正能量,业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动能,感召着无数国人,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壮志豪情,攻城拔寨攻坚克难,正向着无限美好的明天奋力前进!

钟芳